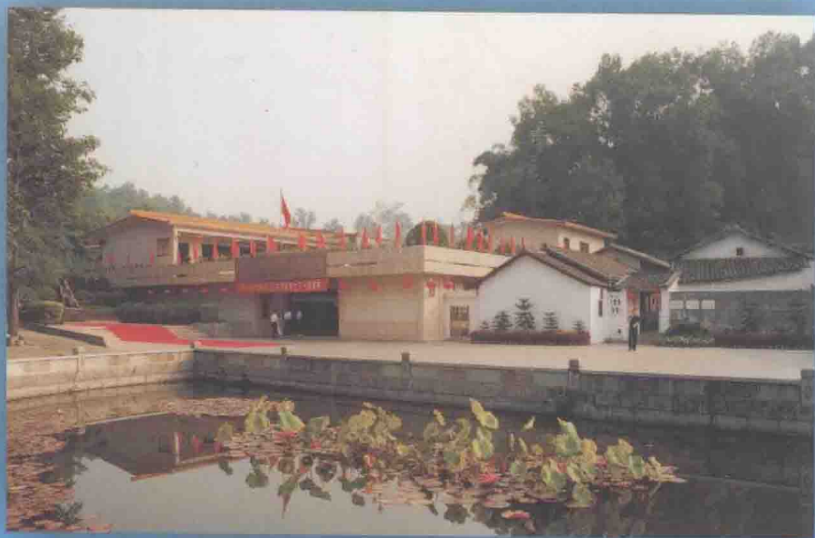


梅州文史 第十七辑

# 客家文化研究与 梅州名人故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梅州市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会委聯《史文研》局四業村郊市州梅

# 客家文化研究与 梅州名人故居

林文林 朱文君 章國相 林亞品

(主編) 郭志丁 王表樹 呂耿貴 曾煥寬

陳登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梅州市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〇五年十月

# 梅州市政协第四届《梅州文史》编委会

主 编：陈定开

副 主 编：古求能 罗青山 曾小苏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启标 陈国章 张众先 林文祥

罗锐曾 黄顺昌 谢秀兰 丁思深(特邀)

责任编辑：古清华

新会商榷会直月八國中

編委員委科管史文味日半會員委市四第在末九

月十年五〇〇二

# 目 录

## 客家论坛

- 毛泽东的客家观及其实践····· 曹春荣(1)
- 客家人与客家文化····· 乔还田(11)
- 闲话客家····· 陈国凯(16)
- 加强客家文化研究 推动客家文化创新····· 陈定开(26)
- 梅州：“世界客都”的打造····· 严 峻(30)
- 客家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
- 读丘菊贤教授的《客家综论》与《梅州客家研究大观》····· 杨东晨(57)
- 清朝前期“过番”的梅州客家人····· 魏明枢(63)
- 今日香港客家村····· 徐杞富 李景钦 [香港](76)
- 客家妇女的特色····· 王珊书(90)
- 客家民系与客方言的形成····· 谢永昌(95)
- 客家民俗文学研究和创作的一面旗帜
- 黄火兴《梅水风光》序····· 程贤章(103)
- 《梅水风光》序····· 杨光华(107)
- 《梅水风光》自序····· 黄火兴(109)

山歌剧的历史与现状·····	罗锐曾(113)
第一部搬上舞台的山歌剧:《好夫妻》·····	刘发清(117)
梅州客家“山歌外交”活动·····	谢如剑(121)
广东汉乐简介·····	李德礼(128)
“广东汉乐”源于“中州古乐”·····	丘煌(143)
客家人敬祖祭祀的习俗·····	谢如剑(151)
梅州客家民居围龙屋述略·····	陈逸铨(156)
大埔“人文兴县”侧记·····	何永年 黄卫军(170)
印尼雅加达巴城中学的光辉史迹·····	李力 [香港](175)

## 名人与客家

### 两位客家人,一对诗兄弟

——记黄遵宪与丘逢甲的友谊····· 丘铸昌(185)

### 末世歌者

——黄遵宪印象····· 蒋乐仪(195)

“马石下”与黄遵宪、丘逢甲····· 古勇辉(206)

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丁思深(208)

丘逢甲的家庭和家庭文化····· 丘晨波(221)

百年张裕见证爱国赤忱····· 刘嘉伦(231)

罗福星与台湾人民的抗日复台斗争····· 赖雨桐(242)

丘荷公撰写《宋芷湾墓表》····· 谢崇德(248)

宋湘的梅县三十六堡诗····· 古伟贤(250)

### 清风明月 山高水长

——怀念古歆祥校长····· 刘发清(251)

## 名人故居

- 叶剑英元帅故居与纪念馆····· 史文(257)
- 黄遵宪故居——人境庐····· 史文(263)
- 朱云卿故居····· 史文(268)
- 张民达故居····· 梅县政协文史科(270)
- 邓仲元故居····· 梅县政协文史科(271)
- 宋湘故居——京兆堂····· 梅县政协文史科(272)
- 蔡蒙吉故居····· 梅县政协文史科(273)
- 张弼士故居——光禄第····· 史文(274)
- 杨缵绪故居——通议大夫第····· 大埔县政协文史室(275)
- 何如璋纪念馆——人境庐····· 大埔县政协文史室(276)
- 邹鲁祖居——敬爱堂····· 大埔县政协文史室(277)
- 吴奇伟故居——棣萼楼····· 大埔县政协文史室(278)
- 罗卓英故居——江东小筑····· 大埔县政协文史室(279)
- 范汉杰故居——杰庐(火船屋)····· 大埔县政协文史室(280)
- 赵公武故居——武颂庐····· 大埔县政协文史室(281)
- 丘逢甲故居——培远堂····· 蕉岭县政协文史科(282)
- 罗福星故居····· 蕉岭县政协文史科(285)
- 谢晋元故居——儒林第、荆树居····· 蕉岭县政协文史科(287)
- 丁日昌故居——都转第····· 刘冬兰(290)
- 徐名鸿故居——锦江楼····· 文雁英(292)
- 李坚真故居····· 黄友清(294)
- 李国平故居——问庐、省三庐····· 林三益(297)
- 吴六奇故居——少师第····· 文衍源(299)

词 人 名

古大存故居	万润贺(301)
李惠堂故居——联庆楼	万润贺(303)
李威光故居	万润贺(305)
大埔三河中山纪念堂	史文(307)
爱春楼	史文(308)
(310)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
(311)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
(312) 林文文村县县新	堂北凉——词姑南宋
(313)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吉紫藤
(314) 文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15) 堂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16) 堂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17) 堂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18) 堂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19) 堂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20) 堂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21) 堂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22)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23)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24)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25)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26)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27)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28)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29)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30)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31)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32)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33)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34)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35)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36)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37)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38)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39)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40)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41)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42)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43)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44)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45)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46)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47)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48)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49)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350) 林文文村县县新	词姑李润贺——词姑李润贺

# 毛泽东的客家观及其实践

曹春荣

毛泽东对客家人(即毛氏所谓“客籍”)的关系及其客家观的形成,并非空穴来风,亦非刻意为之;而是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原由,也就有迹可循。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前途如何,这个问题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内激烈争论过,有人为之困惑、迷惘,甚或沉沦;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却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地方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必然导致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的客观存在中,看到了“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的可能性。<sup>①</sup>由此,毛泽东们提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思路。然则举国当中,什么地方才利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呢?毛泽东认为应是具备下列条件的地方:(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sup>②</sup>这样,在大革命(尤其是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福建等省,特别是这些省份的边界山区,自然就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首选之地。而上述各省的山区,尤其是省与省、县与县的交界、插花山区,即通常所谓“山高皇帝远”的“三不管”地带,又正好是客家人聚居的地



方。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客家人，为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作的无奈、却不失明智的选择；以及中国革命为冲破帝国主义联合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强大势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艰难、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巧合。不过，这种历史巧合，在中国革命史上已发生多次，例如太平天国革命，例如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以客家人聚居地为首义地区及大后方。这也正好表明了中国革命和客家人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表明了客家人在中国革命坐标中的固有位置。饱读中国史籍，并钟情于中华文化奇葩——地方志的毛泽东，岂能对上述情形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关于这一点，目前虽未见到他的论述文字，但从他十分注重客家地区的社会调查，从他对客家源流、秉性的精确了解，不难推论。当他亲自参与并领导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实践后，当他以被他民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后，他对上述情形的观察与思考显然更加自觉、理性、系统、全面，更加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块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的革命根据地，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全盛时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余万。居住在這一地带的，除了土籍即所谓“本地人”外，还有部分客籍即外来户。先到的土籍占领着生产生活条件较优越的平地，掌控着当地绝大部分政治、文化、耕地、经济资源。后到的客籍只能退而求其次，占领那些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的山地，并承受土籍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与社会歧视。由此造成很深的土客籍历史仇怨，很严重的边界各县、尤其是宁冈的土客籍矛盾与界限。这种土客籍矛盾与界限，被土籍地主豪绅刻意渲染、恶意挑起与利用；被共产党内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的领导干部引入工农阶级内部，以至党

内，便对革命、对党的建设、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为了兴利除弊、扬长避短，保障革命目标、人民利益的完全实现，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自己的客家观。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题为《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把上述客籍问题作为边界各县党的组织问题之一，作了报告。这是毛泽东的客家观最早、最集中的表露。此外，他在井冈山的革命实践（如进行党内教育），也有这方面的表露。综合起来，其内容主要是：

一、客家人是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南方的，他们居住在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的地带，人口大概有几百万人。

从1928年上溯，至南宋开始是801年，至明代开始是560年，至清代开始是284年。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数百年”，按常理讲，不会是一二百年、二三百年的，也不会是近千年。那么，就可能是五六百年或七八百年。由此似可认为毛泽东心目中的客家人，是南宋以降由北方徙居南方的中原人，以及明清两代由闽粤回迁赣、湘等地的“老客家人”。按客家人在长江以南的主要聚居区，集中在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及湖北南部的一些县份，并以省际、县际边界地为大本营。这些地方的客家人数，当年估计有几百万人。所以，毛泽东对客家渊源的认识，对客家分布的估量，是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是科学的。他对上述诸省——土地革命战争的主战场与大后方，红色政权最有希望首先连片出现的地方，它们的土客籍问题的关注与重视，也是符合实际、切合革命利益的。

二、客家人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因此，客家人有革命翻身的强烈愿望，欢迎并投向民主革命。

民间向有“先到为君，后到为臣”的说法。意即谁先到一个地方居住、开发，谁就拥有主导该地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优先权。因此，客家人常常被土籍，主要是土籍地主豪绅视为外来户，低人一等，受尽后者欺凌压迫。

红色政权未建立时，边界各县的县、乡政权都被土籍豪绅掌控，客家人没有说话权。客家人租种土籍地主的田，不仅要缴纳苛重的地租，还得承受名目繁多的劳役，每年开春还要请田东吃“新年饭”。土籍地主豪绅可以任意凌辱客家人的妻女，客家人只能忍气吞声。客家子弟不能和土籍子弟一起，同进一个学校念书。有压迫就有反抗，就会酿成革命。井冈山绿林首领之一的袁文才，就是这样逼上梁山，并在毛泽东的亲自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客家人。1926年和1927年的国民革命，客家人表示欢迎并积极支持，以为出头有日，也是这个道理。岂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但是，客家人倾向革命，需要革命，愿为革命毁家纾难的立场与态度，却再次为世人、尤其是共产党人瞩目。毛泽东就特别看重这一点，想办法调动客家人的革命积极性，并加以爱护。他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的种种思考与实践，都有这方面的力证。

三、土客籍矛盾与对立，是地主阶级搞起来的，是违反工农利益的。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和处理这类事。

毛泽东观察与思考土客籍问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抛开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跳出了剥削阶级为之设定的窠臼。他不是笼统地把土客籍视为矛盾对立的两方，对具体事件的分析评判，也不是简单地说声哪方对，哪方错。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思考、处理土客籍问题。在他看来，土籍人中有剥削者、被剥削者，有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客家人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也会发生变化，也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

而反革命的之分。压迫剥削客籍人的，主要是土籍的地主豪绅、流氓地痞。土客籍的矛盾对立，本质上是地主阶级和客籍农民之间的矛盾对立，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笼统地提土客籍矛盾，容易掩盖阶级矛盾，不利于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土籍、客籍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他们应当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土客籍矛盾对立问题。<sup>③</sup>

四、不应把土客籍的界限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以免发生无谓的斗争。

边界各县的党员，入党时既无充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入党后又未及时接受经常的正确的党内教育，因而思想上有不少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土客籍界限以及与此相连的地方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党员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思想意识带到工农阶级内部，甚至带到党内，引发无谓的斗争，严重危害党的团结，危害革命事业。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已经成了红军将领的袁文才、王佐被错杀。袁、王被杀原因很多，但袁站在客籍立场行事，龙超清等站在土籍立场行事，偏离了阶级利益、党的利益，却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袁、龙在这件事上的过错、责任不尽相同，有大小、轻重之分）。

毛泽东深知把土客籍界限引到工农阶级内部，尤其引到党内来的严重后果：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土客籍的矛盾对立，反而有利于土籍地主豪绅分化工农阶级，分化共产党，从而从根本上损害客籍人的利益。所以，毛泽东特别提出这个问题，以引起党内关切。他认为，在党内要加紧教育，使广大党员明白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明白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县界、区界、乡界，不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也不分你是土籍，他是客籍，而只分谁是那一个阶级。通过教育，使土客籍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这样做了，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客家人的利益。

综观毛泽东的客家观，我们不难发现它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眼光去审视客家现象及其问题；二是把客家问题置于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大范围内予以考察和研究；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解决客家问题（包括客家内部的、客家与土籍的问题）。

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与需要出发，提出并解决客家问题的。因此，他的客家观的成功运用（即实践），也就与此紧密相连。在井冈山改造袁、王部队即其一。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1929年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遭到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十八个团近三万兵力的重重包围。山上红军粮弹奇缺，衣单不御寒。为粉碎敌人“会剿”，保卫根据地，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出击赣南，一路留守井冈山。为什么选择出击赣南？原因很多，但不可忽视的是，赣南有多个县与福建、广东交界，又多山，是客家人的大本营之一。赣南与闽西、粤东山水相连，声气相通，取得赣南即易于向闽广发展而连成一片。这些有利因素，毛泽东早就了然于胸。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果然如鱼得水，听得懂客家话，吃得惯客家饭，做得了客家活，真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这里的人民群众也待红军如亲人，愿跟红军闹革命。毛泽东于1929年4月5日在瑞金写给中央的信中，就动情地说道：“瑞金民众如火如荼的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sup>④</sup>

毛泽东还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指出“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从而向中央提出了近期“争取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的战略决策建议。<sup>⑤</sup>这个建议后来化作创建以瑞金为中心的，包括客家人占大多数的赣南、闽西连片地块的中央苏区的现实，再一次验证了毛泽东客家观的正确。

为了启发客家工农的阶级觉悟,激励他们的革命意志,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水平,毛泽东想方设法了解客家、熟悉客家、亲近客家工农。他最常用的办法便是做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取得对客家问题的发言权。

1928年春,他做了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加上此前的湘东五县(毗邻赣西)调查,使他弄清了湘、赣、闽、粤等省客家的来历与分布,明了他们在当地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感受到他们要求翻身的迫切愿望和对于国民革命失败的沮丧心情,及至熟知他们的民性习俗,他们和土籍的历史的、现实的仇怨。因而,他得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慎重地提出土客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从井冈山下来,转战赣南、闽西后,毛泽东对客家社会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更勤更多了。这固然因为赣南、闽西(还有粤东即梅州地区,这里也是后来的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是国内最大一块客家人聚居区,其中不少县如赣南东部诸县、闽西汀州府属各县、粤东嘉应府属各县,还是纯客县,其居民的绝大多数都说客家话。而如何正确认识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中的客家社会的异同,并据以采取不同的政策策略,也应当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大量社会调查的一个动因。因为在这里,尤其是大家都说客家话的纯客县,是没有如井冈山那边极其分明的土客籍界限的。这里的客家问题的重心,也就与井冈山那边有所不同。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做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以及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多个农村调查。虽然,在这些调查中,毛泽东并没有单独把客家问题作为重要内容列出,在他的调查报告中,也没有单独报告上述各地的客家情况,以及与土地革命相关的客家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忽视。除了上述原因外,我们还可以推想这是毛泽东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处理客家问题的必然结果。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调查报告所涉社区、事件、人物、风

俗、语境等，基本上都是客家的，这就够了。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作的第一个大型的社会调查。“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sup>⑥</sup>这就是毛泽东选择此地搞社会调查的最初想法。又因为寻乌是纯客县，明了了这里的客家情况，三省交界各县，以至南中国的客家情况也就大体清楚了。

《寻乌调查》全面而精详地揭示了该县自然、社会之历史与现实状况，尤其是这里的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当时的土地斗争状况。从中我们能深切体会到客家工农受同是客家的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悲惨境遇；透过温情脉脉的宗族祠堂、神坛寺庙、桥会文会的面纱，看到客家社会内部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对劳苦工农的巧妙压榨。从中我们还能深切感受到客家风俗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作用与影响。例如，寻乌风俗，屋主不欢喜新来的住户在他家里生儿子，以为那样，他一家的“精灵”会被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由此毛泽东想到土地革命中的房屋分配，应由“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按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sup>⑦</sup>又例如，寻乌风俗不赞成移民搬家，“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还有迷信风水、地理原因等。其实，“农民相信风水是于他们的生产有利的。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宝贵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sup>⑧</sup>

仅从以上所述，我们便可以知道，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作的客家社会调查，对他实践自己的客家观，更为有效地发动、指导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为实践自己的客家观。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建设与党内教育。他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增至八项注意),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共产党员要讲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等一系列原则。他耐心教育群众破除迷信“八字”、风水、菩萨,讲究宗族祠堂、地界姓界等封建观念,树立阶级观念、科学观念。他用敌人做反面教员说,敌人来了,不管你是土籍、客籍,也不管你是那个地方的,凡是革命的就一律镇压、屠杀。他在培养土籍干部的同时,也注意培养客籍干部。特别是在客籍人多、土籍人少的地方,设法把客籍干部培养上来,并由他们担任当地的主要领导。建立、发展党组织,也十分注意这一点,重视发展客籍中贫雇农党员。与此同时,在经济上也注意土客籍群众一律平等,比如分田,不把坏田分给客籍农民。<sup>⑨</sup>通过这些努力,使土客籍工农群众觉悟起来,感奋起来,消除彼此界限,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在实践自己的客家观方面,毛泽东还很注重政策策略的运用与调整。他一向认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革命任务,“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sup>⑩</sup>解决客家问题,也靠正确、坚决的政策策略。

井冈山时期,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放言客籍将要杀土籍,致使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你来我往、掩盖了阶级矛盾的土客籍对立情况,还反映到党内,引发无谓的斗争。对此,毛泽东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sup>⑪</sup>与此同时加紧党内教育,使土客籍党员率先团结一致。经过上述努力,边界的土客籍对立状况大为改善。

毛泽东对袁文才、刘辉霄、王佐等的用人策略也是有讲究的,



那就是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并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有步骤地促使他们进步和走向革命。上述三人都是井冈山地方武装的负责人,但袁是客籍人,刘是土籍人,而且是袁的对手龙超靖(土籍)的好友。王虽为土籍,但与袁是洪冈会的拜把兄弟。如此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容易被土客籍关系掩盖。毛泽东为此颇费心谋。1929年1月中旬,红四军主力下山,毛泽东调袁文才当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当前委秘书长,王佐留守井冈山。毛泽东的想法是把袁、刘带出去开开眼界,以利于他们的世界观的转变。另外,把这对矛盾体带在身边,也有利于井冈山的内部稳定。可惜的是,袁、刘半道折返井冈山,酿成袁、王被杀悲剧。辜负了毛泽东一番良苦用心。<sup>⑩</sup>总而言之,毛泽东对客家问题的思考与实践,都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与党的建设密切相关。而这一方面,在过去的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中,似乎并不多见。但这确实是个重要而有趣的课题。本文倘能抛砖引玉,则不胜欣慰之至。

#### 参考资料:

- 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 ②⑪《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7、75页。
- ③⑨参见陈正人:《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4页。
- ④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58页。
- ⑥⑦⑧《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168、169页。
- ⑩《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
- ⑫参见陈伯钧:《井冈山烽火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53页。